

辛亥保路运动中温江人民的斗争

温江县志办公室

清代宣统三年（1911）秋，四川爆发了一场震撼全国的保路运动，是年为甲子纪年的辛亥年，所以一般称之为“辛亥保路运动。”这场运动从当年四月十一日（5·9）清廷宣布铁路收归国有之日起，至当年十月七日（11·27）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成都宣布独立止，历时达半年之久。其影响所及，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而且为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条件。孙中山先生在评论这场运动时说：“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还要迟一年半载。”在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我县前辈们以高昂的反帝爱国激情和大无畏精神，积极投入斗争。他们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勇往直前，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为反对帝国主义、推翻清王朝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尽管岁月流逝，运动至今已有七十四年，但前辈们的英雄形象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却令人记忆犹新，肃然起敬。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争取早日实现“四化”宏图，前辈们给我们留下的这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仍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值得加以继承和发扬。

温江人民的保路斗争与全川情况基本相同，大体上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保路同志会开展“文明争路”的斗争。第二阶段则是以罢市为契机。转入武装起义斗争。温江人民在斗争中有“三早”，即成立保路同志分会的时间早；掀起罢市早；打出“保路同志军”的旗帜早，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温江人民果敢坚定，一往无前的精神。

一、成立温江县保路同志分会，主要“破约保路”

宣统三年（1911年）初，清廷任命大买办盛宣怀为邮传部尚书，向帝国主义列强磋商大批借款。同年四月十一日（5.9），清廷以“上谕”宣布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相隔只有九天，盛宣怀即与英、法、德、美四国签订了这两条铁路的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四国共给中国六百万英镑的贷款，交换条件是中国出让铁路修路权。合同签订后，四川、湖北、湖南、广东四省人民群起反对，特别是四川人民眼看自筹的川汉铁路公司股金一千六百七十余万两行将为帝国主义所吞没，辛苦修筑而且大部竣工的宜昌至归州段铁路工程亦将随之化为乌有，反对更为强烈。其时设于成都的川汉铁路公司在立宪派的控制下，于宣统三年五月二十一日（1911.6.17），宣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要求归还路款，并进而声讨清廷夺路劫款、卖国卖路的阴谋。为扩大声势和影响，该会还派出许多人员，下到各州县，发动多地成立保路同志分会。

五月二十八日（6·24），我县各界代表于城内城隍庙

租股局（现德阳军分区驻地）召开了县保路同志分会的筹备会。接着在六月七日（7.2），借地官高等小学堂（现东风路第一小学校址）召开有四百二十五人参加的联合大会，正式宣告温江县保路同志分会的成立。按照省保路同志会拟定的章程，我县保路同志分会设干事总机关作为办事机构，下设总务、文牍、交涉、讲演四部。推选曾任《顺天时报》主笔的曾德元（学仁）为干事长。在成立大会上，曾德元登台讲演，侃侃而谈，历数清王朝夺路劫款，丧权辱国的罪行。当时自动围集起来听讲的群众多达二千余人，大家“一经捧喝，众皆寂然，颜色顿变。”六月九日（7.4），我县保路同志分会复致函省保路同志会，报告我县保路同志分会的成立经过，并明确表示：“吾乡父老子弟俱不似在当年酣梦中。犹愿贵会（按：指省保路同志会）坚持破约保路宗旨，催促进行，凡贵会能力所到之境，即敝会能力所到之境，同心戮力，誓死以从”。

根据历史文献的记载，我县保路同志分会成立的时间（六月七日）与全川相较，仅稍后于南充（五月二十五日）、自流井（六月一日）、江津（六月六日）三地，是全川较早成立同志分会的地方。

二、掀起罢市

四川各地保路同志会相继成立后，通过一系列的宣传鼓动工作，全川人民“万众一心，心唯一的，唯知合同失利，唯知破约保路。”清王朝中央政府奕劻、盛宣怀、端方等人，竟不顾全川人民的反对，暗中采取分化、收买手段，始

而支使四川在京作官的宋育人、甘大璋等，以四川京官名义，呈请邮传部将四川所筹路款作为已被出卖了的川汉铁路股本。继而又收买川汉铁路驻宜昌公司总理李稷勋，要他继续用川款修筑已被出卖了的川汉铁路。全川人民闻之后，无比愤慨，纷纷谴责宋育人、甘大璋等人，坚决要求撤换李稷勋职务。清廷非但不予以理采，反而于闰六月初一日（7.26）下令硬派李稷勋仍任宜昌公司总理，让他继续用川款筑路。与此同时，并派端方从湖北率军入川镇压，全川人民更加愤怒，七月初一日（8.24），川汉铁路公司特别股东大会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均于同天开会，决定全川从即日起“所有粮银款项，已解者不必上兑，未解者不必解”。号召抗粮抗捐、罢市罢课。

我县地近成都，当天上午即得到消息，下午有部分商户关门，第二天即全城罢市。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三（1911.9.15）《民主报》记载：“近省州县同省城情形，皆同声响应，温江竟先于初一（8.24）上午罢市。”据此可见我县罢市较成都还提前了半天，是全省较早实行罢市的县。我县罢市时间长达十多天，据一些老人的回忆，直到七月十二日（9.15）“祭祖节”时，市面上还没有猪肉供应。

罢市期间各街道许多人家门前均搭台供奉光绪皇帝牌位，上书光绪遗旨：“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当时称为“办皇会”，群众利用这种形式谴责盛宣怀等违背光绪遗旨，丧权辱国，危害人民的行为。流行于当时的一首名为《来日大难歌》中写道：“自光绪二十八年把路办，银子凑了千千万，也有官的商的款，也有土药烟灯捐。最可怜是庄稼汉，一两粮就要出这项钱，要办铁路是哪一件？怕的是

外人来占路权”。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充分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清王朝夺路劫款，卖国丧权的愤懑之情。

三、酝酿起义

四川保路运动初期，为立宪派所操纵，他们力图把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幻想清廷能够作出让步。后见清廷变本加厉，步步进逼，直接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利益，始被迫转而争取群众进行抗争。是时，四川同盟会员亦加紧活动，早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川同盟会即制定出“联络哥老，适时起义”的方针。川西一带系由郫县同盟会员杨靖中负责联络，吸收我县哥老首领吴直三、吴庆熙等加入同盟会员领导的“汉流改进会”进行斗争。当保路运动发展到抗粮抗捐、罢市罢课的高潮时，同盟会员朱国琛散发《川人自保商榷书》，宣传武装起义，主张四川独立，在全川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宣统三年闰六月十日（8·4），同盟会员龙鸣剑、哥老首领秦载赓等集会于资州罗泉井，号召全川哥老武装起义。我县吴庆熙亦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返县后即将会议精神广为传播，并与其从兄吴直三等积极筹组力量。在其影响下，全县各乡镇民团、哥老莫不闻风而动。

我县酝酿起义过程中、各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吴庆熙、吴直三、曾德元、曾学传、黄茂勋、蒋希益等，时集县城，进行联络策划。各乡镇酝酿起义的活动更是如火如荼，方兴未艾。舒家渡（和盛镇）李小庚和武秀才李瀛仙（仙舟）分头募集丁勇，组建队伍。李小庚特制红色麻布军服，李瀛仙

暗杀一名清军总爷，夺得九子枪一支，以供起义之用。兴利场（玉石乡）简云龙联络保正杨明轩、杨旭初弟兄，与郫县花园场配合，组成一支力量颇强的队伍。镇子场（镇子乡）武举许锡林会同陈玉山召集二百余人，于该地大觉寺设棚，立旗练武，建立起义基干队伍。赵家渡（通平乡）黄瑞廷以保路为号召，组成两百余人的队伍，拥有毛瑟枪二十多支和刀、矛等武器百余件。吴家场（寿安乡）德字袍哥陈玉山在当地义绅的帮助下，组织了一支以社会下层袍哥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备有大号 and 土抬炮等武器。干家店子（涌泉乡）民团首领李远之，广结哥老，连续六天在邹家场宴请柑梓、泉水幽、马家寺、擦耳崖、文家场、苏坡桥等地哥老成员，以团勇为基础，组成一支百余人的队伍，备有军旗，过山号、明火枪以及刀、矛之类的武器。该地武举宋熙之亦召集团勇、哥老，组成四百余人的队伍。隆兴场（永宁乡）下码头哥老首领杨建廷（绰号“金眼大王”）与其兄杨善廷共同组织队伍，有众百余人，头裹青纱，身穿红色号褂，军容十分整齐。此外，永胜场（永胜乡）雷吉山、黄益山、傅良臣；牟家寺（属柳林乡）戴孟阶、李培基；刘家濠（金马乡）胡昆山；太平保（公平乡）官文等，均各在本地组织起义队伍，全县几乎遍地武装，形成一座巨大的兵营，整个斗争已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况。

四、高举“保路同志军”旗帜，围功 成都

宣统三年七月十五日（1911.8.7），四川总督赵尔

丰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骨干蒲殿俊、罗纶及我县举人王铭新（四川铁道学堂监督）等九人，并于督署门前枪杀请愿群众三十余人，我县当晚即得到消息。民国《温江县志》记载：“夜二鼓、邑中风闻其事”。“豪民黄茂勋、何祖义、蒋希益等起义树旗曰“温江县保路同志军”。各团勇纷纷冒雨连日夜行泥淖中，明日抵省城南门外公园。”从有关当时史料来看，龙鸣剑、秦载赓等于资州罗泉井会上，虽曾决定改保路同志会为保路同志军，但在七月十六日（9.8）参加围攻成都的各路队伍中，我县打出“保路同志军”的旗帜是较早的。

黄茂勋等所率的保路同志军于七月十六日（9.8）拂晓开抵草堂寺。当天早晨，吴庆熙、曾学传等人即在县城会商，决定宣布温江全县起义，并将这一决定迅速通知各乡镇。吴庆熙本人则于当日率领队伍驰赴草堂寺，增援黄茂勋等部。行军途中尽管阴雨不绝，道路泥泞，但士气十分旺盛，战士们不断高呼：“不救出蒲、罗九人不还家。”“不推翻满奴不还家。”吴部抵达草堂寺后，为了统一指挥，增强部队战斗力，大家共推吴庆熙任统领，吴直三任副统领，杨鹤琴为军师，郭煦、邓伟然分管后勤和军法工作。庆熙旋以“川西北同志军统领、人民复汉军总司令”名义发出布告严申军纪，并昭示：“吾之所以来省，为父老除害，非有所侵暴。待诸同志到，共举贤能，以定川中大计耳。”并改旗为“四川保路同志军”。

七月十八日（9.10），舒家渡一支同志军在李瀛仙的率领下亦开到草堂寺。七月十九日（9.11），川督赵尔丰下令清陆军十七镇和驻成都的巡防军，向围攻成都的各路同

志军进行反击，我县同志军在草堂寺一带与清军展开激战。罗守经所部二百余人于中坝碾奋勇冲杀，大挫清军。官文率刘子云、官辉山等数十人，在草堂寺附近的和尚桥用土炮向清军轰击。因火药受潮，一时未能击发，待清军逼近，土炮突然爆发，毙伤清军多人，清军误以为官文队伍善放“闷炮”，纷纷引退。

清军发起反击的当天，各路同志军首领齐集郫县城隍庙共商对策，我县派曾德元为代表参加会议。会议重申“誓死保路，以倒清、洋”同时制定“敌多于我，退而避之；我多于敌，战而歼之；退而复进，散而复聚，愈聚愈多，战而胜之”的作战方针。会后，各路同志军即从成都四郊作战略撤退，我县同志军亦由草堂寺撤至文家场（现成都金牛区文家乡），在这次成都围城战中，我县同志军参战人数甚多，作战勇敢，屡予清军以重创，清军闻风丧胆。在一首题为《蜀中同志军纪事诗》中说：“鱼鳧疆城阵如云，弹雨枪林处处闻，一百四十余州县，羽檄交驰势若焚。……城外防军多失利，城内陆军无斗志，锦城险作九里山，四面楚歌魂惊悸”。比较真实地记叙了当年成都围城战斗情况。

五、辜家碾阻击战

当我县同志军退至文家场后，吴家场的黄星耀、兴利场的简云龙亦率众来会，力量渐增雄厚。为了保证军需，吴庆熙带头尽出家财，向县中富户征借粮款，并聘解职家居的清守备高光明出为指挥军事。

七月二十四日（9.16），清陆军十七镇三十四协陈德

麟部从成都分两路“清剿”，一路出老西门，经戚家堰、朱家烧房等地攻击前进。一路出新西门，经苏坡桥，向驻守在文家场的我县同志军发起进攻。我县同志军于文家场所属的辜家碾一带迎头阻击，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李远之部截击清军于红碾子，清军隐伏于碾沟内，占据有利地形射击，李部勇士冒险打开碾闸放水，清军失去屏障，李部乘势冲击，清军狼狈败走。此次战斗，李部苏海山，涂海云等战士缴获清军九子枪等多种武器，黄安邦等战士则不幸光荣牺牲。官文率队设伏于辜家碾侧近的郭姓院内，杀死清军四人，将其首级悬挂院子四角，以寒敌胆。“金眼大王”杨建廷部开始与清军交火于宝云庵，后撤至红碾子，撤退途中边战斗，边向清军展开宣传攻势，高喊：“巡防军，回头好，不早回头命难保。劝你们，把戈倒，协力推翻清王朝。兴中华，建民国，为国富强立功劳。”义正词严，气薄云天。

清军于辜家碾受阻后，不敢贸然前进，重又退回成都。此时，吴庆熙即欲趁机一鼓作气攻占温江县城，吴直三、黄星耀等人以县城距成都甚近，无险可守，力加劝阻，庆熙方打消此念，乃率队绕过县城，进驻兴利场。该地系温江、崇庆、灌县交界之处，毗连水城，接壤山区，进可攻、退可守，且易与邻县联络，彼此可以缓急相助，实为理想的屯兵之地。庆熙在兴利场屯兵期间，一面整顿部队，一面派黄茂勋赴相邻的西南各州县联系，争取支持，扩大影响，以便待时而动。

六、县城争夺战

川督赵尔丰对我县同志军异常恐惧，时刻惴惴不安。

在上给清廷的一封奏折中说：“现在大股‘匪团’最有势者，惟温江、双流两处。”又说：“……他处州县迭来惊报，温江尤急，伤我军士多人，已有不可兼顾之势。”为此，他于七月二十八日（9.20）下令清陆军十七镇三十四协一部进驻我县，专事“清剿”。吴庆熙事前得讯，乃约请彭县刘丽生、崇庆县孙泽沛支援，欲图共逐清军，攻占县城。在清军进驻县城的当天，刘丽生、孙泽沛亦率众开抵县城郊外。经商决定，刘丽生部入城偷袭，吴庆熙、孙泽沛两部则协力从西门正面攻城。吴庆熙并指派罗经、袁辉武、张建昌三人先行潜入城内，以为内应。

七月二十九日（9.21）晚上，刘丽生部由北门登梯入城，殊刚行至北街城隍庙后墙（现军分区驻地）即被清军哨兵发现，于是双方展开巷战。清军发现县城已被同志军包围，处境不利，鏖战至次日凌晨，便齐向西门处撤退，临撤退前将入城内应的罗经等三人逮捕杀害。

清军撤至西门外双凤桥时，即与吴庆熙、孙泽沛两部攻城的同志军遭遇，同志军同仇敌慨，奋勇当先，清军难于招架，竟用煤油浸渍棉花塞于枪口，疯狂向周围民房射击，引起大火，到处延烧。西外街道从树荫楼（现市五医院家属院）起至西禅寺止，全长近两华里的房屋除少数为高墙所护外，其余均被化为灰烬，其中两家花纸铺大火焚烧三日不绝。同志军被迫撤至孙家碾，与清军再战，吴庆熙部旋退舒家渡、赵家渡一带，孙泽沛部则向崇庆县退却。清军尾追孙部不舍，在孙家巷子再次发生战斗，孙部伤亡甚重。追击孙部的清军经过羊马场时，又纵火焚烧该场房屋。

在吴、孙部与清军激战于西门外的同时，另一队清军骑

兵，由郫县窜至城南，在大南门外与干家子宋熙之所部同志军百余人遭遇，清军复纵火烧房，一时火光烛天，烧毁大南门外陕西会馆（现粮食局南关仓库）一带民房百余间。宋部同志军怀着满腔仇恨，利用熟悉家乡地形的有利条件，与清军短兵相接，肉搏血战。清军伤亡累累、遗尸遍地，同志军亦有较大的伤亡。此役“西、南门外，街市四野流血，横尸不可胜数”（民国《温江县志》），倒在血泊中的同志军勇士们有的还紧抱敌尸，有的犹怒目握械，情景甚为悲壮。

清军兵力本极有限，面对各路声势浩大的同志军，往往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八月中旬驻温清军被调往他处“清剿”，吴庆熙乘温江城防空虚之际，乃率同志军数千人进驻县城。县知事晋和迫于形势，愿与同志军合作，吴庆熙主持军事，晋和主持民政。庆熙将部队命名为“安庆营”，自任统领，高光明为副统领。全县人民承担军饷，踊跃捐输，城内人心安定，秩序井然。

八月二十日（10·11），清巡防军一营突袭我县，企图占领县城。前锋距城只有数里，而当时驻守城内的同志军不过数百人，敌我力量悬殊很大，情况十分险恶。庆熙沉着镇静，指挥若定，一面周密部署守城兵力，一面促晋和登城向清军喊话，宣称：“城中皆民团，非寇也。”清军不信，开炮轰城，守城同志军也开炮还击，击毙清军官兵十余人。清军见城中有备，只得退走，并扬言不久将运来大炮报复。庆熙鉴于守城力量单薄，除向邻近州县求援外，为使县城避免再遭战火之苦，决定暂时撤走。撤退前，动员群众出城暂避，当天午后阴云密布，风雨交加，城内群众扶老携幼纷纷走避，整个县城基本上成为一座空城。

八月二十二日（10.13），清军果然派来大队，汹涌入城。见城内除知事晋和外，阒无人迹，清军无奈，颓丧而去。清军退后，庆熙复率队返城，避难的群众亦随之相率回家。八月二十四日（10.15），应邀前来支援的邻县同志军共二千余人抵温，因见清军已退，仅在城内留住一宿，即各返原地。不久，南路同志军作战不利，新津失守，我县左翼受到严重威胁，庆熙遂率部退驻兴利场。

七、支援邻县，协同作战

我县同志军人数众多，力量雄厚，英勇善战，声威远扬，在武装起义斗争中，曾多次支援邻县，相互配合作战，屡挫清军，战功卓著。

1. 支援双流、郫县进攻成都

七月十七日（9.9），双流同志军向迪章部围攻成都，在红牌楼为清军所阻，情势危急，飞函求援于我县驻草堂寺前线的同志军。吴庆熙立派李培基、杨旭初率队往援，与清军激战。战斗中，我县五十多名同志军战士壮烈牺牲。

七月十八日（9.10），我县舒家渡的一支同志军由李小庚率领，取道郫县前往成都参加围城战斗。于望丛祠附近与清巡防军遭遇，短暂交火后，摆脱敌人，迅速驰赴成都老西门外，协同杨旭初及郫县花园场张海云部共数千人，于犀浦与清军交战，战况非常激烈，时任学生军第二中队长的我县中学生姚中翔牺牲于此役。

2. 支援新津的战争

七月二十一日（9.13），新津同志军首领周鸿勋率所部“武字营”，在黄水河、花桥子一带抗击清军，我县派出吴廷章、胡昆山、傅良臣、李培基等部前往增援。杨公镇一战，吴廷章战死，李培基手臂负伤。我县李树勋（樾森）、冯时雨（习之），亦曾率队往援，尔后，复转战于成都府属十六州县。

3. 配合崇庆，在三渡水伏击清军

驻守崇庆州的清军三十三协六十六标第三营为该县同志军孙泽沛部所包围，处境极其困难，清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命该镇三十四协六十七标一营二队新运弹药，前往增援。该队官兵共一百三十五人，连同挑运弹药的伏役数十人由队长周启俭、督队官陈锦江率领于八月中旬，从成都抵温江，到达三渡水河边时，河上木桥早被同志军破坏，仅余两只木船，由于木船载重有限，往返费时，及至全队尽渡已是夕阳西下。

这支清军增援崇庆的消息，先一日即为双流同志军侦悉，由该县同盟会员彭家骥（彭家珍之弟）间道急报温、崇两地。经两县协商，推崇庆县孙泽沛统一指挥，在三渡水伏击这支去崇清军。孙命所部肖庆南和我县李树勋、冯时雨部伏击于西岸，东岸则派我县吴直三、黄卓云、官文、罗双南等部埋伏。在清军全部渡到西岸后，两岸突然山号齐鸣，伏兵四起，将清军团团包围，清军队长周启俭当场被击毙。督队官陈锦江系同盟会员，表示愿交出武器弹药，共同反清，

殊正交涉间孙部同志军千余人骤然涌到，未及询问原委，即将陈锦江劈死于一农家院内。其余已被解除武装的全队清军连同伏役，亦均同时被杀。此次伏击固然解除了围崇庆同志军的后顾之忧，有利于巩固南路同志军的左翼防线，但忽视优待俘虏政策，增加了清军士兵的对抗情绪，不利于分化瓦解敌人，尤其是误杀同盟会员陈锦江，更是一个明显的错误。

4. 支援郫县的战斗

九月上旬，郫县同志军告急。吴庆熙派吴直三率领许锡林、鄢茂和、雷吉山等部驰往增援，与清军连续作战十余次，屡战俱胜，九月二十三日（11.13），复与清军战于郫县南门外火烧桥，吴直三身先士卒，奋勇冲杀。清军炮兵伏于附近蔗田中向同志军轰击，直三被弹片击伤腰肋，伤势甚重，战士们欲将他负离战场，他坚决不允，忍痛持刀直前，刀劈清军二人后，复中炮阵亡。

自各地同志军发动武装起义以来，经过多次战斗，清军屡遭败北，士无斗志。包括我县在内的成都附近州县如双流、崇庆、新津、郫县、灌县、新都、彭县、金堂、什邡、大邑、蒲江以及简州、资阳等地，基本上已被同志军所控制。川督赵尔丰困守成都，一筹莫展，已成瓮中之鳖，不得已于十月七日（11.27），交出政权，由蒲殿俊、朱庆澜等组成大汉四川军政府，成都宣传独立。吴庆熙即于当天率队移驻县城，至此，我县保路武装起义斗争始告结束，在我县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5. 9. 9 初稿

民主革命志士吴庆熙

袁中行 供稿

县志办人物编辑组 整理

吴庆熙名荣超，别号玉著。（1871——1922）世居温江清平乡（今万春乡）明山寺侧。家产中农，父亲吴师古是县中知名的塾师。由于学优教严，出其门下的秀才达数十人之多。庆熙幼年随父就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及长，蔑视科举，弃文习武，常随从兄吴直三学兵书，论时事，他们弟兄俩对清廷腐败，丧权辱国的行为非常愤恨，从而激励了他们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直三因受大足教案的启迪，联合庆熙，在乡间利用会党关系，组织哥老和穷苦民众，竖起“替国诛洋”大旗，开展了反对满清，赶走洋人的斗争。（人们称他为“假余蛮子”），起义队伍与清军转战于温江、郫县、崇庆、灌县一带，并协同金堂义和团首领廖观音进攻成都，终因清政府强烈镇压起义军而失利。但庆熙在斗争实践中受到锻炼，因他“素豪于义，不事空文，惟志革命”，广交革命志士，人们誉称为“吴二大王”。^①

四川保路运动，自辛亥年四月十一日（1911. 5. 9）清王朝宣布铁路国有之日兴起，“破约保路”的口号震撼了

巴山蜀水，抗捐、罢市、罢课的活动，把保路运动进一步推向白热化。七月十五日（9.7）四川总督赵尔丰逮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蒲殿俊、罗纶、张澜、王铭新（温江人）等九人。^②（逮捕蒲罗等人有多说，见文后“附注”）成都市民数千人约集督署，要求释放为四川人民争路的蒲罗等人。赵尔丰不顾群众的请求，枪杀市民数十人，造成成都大血案，激起全川人民的反清斗争。成都附近十余州县人民纷纷起义，发动了一、二十万人的“保路同志军”队伍，点燃了四川全民大起义的烈火。早在清宣统元年（1908）春，吴庆熙经杨维、但懋辛、黄次峰介绍加入了同盟会。结识同盟会员、会党首领张捷先（灌县）、张达三（郫县）等，加入了郫县杨靖中所组织的“汉流自治改进会”，联络志士、会党、哥老进行反清活动。在此期间，他曾到剑阁宣传同盟会宗旨，揭露清王朝卖路害民的罪恶，激励了剑阁人民的斗志。清宣统三年（1910）庆熙为了瓦解清政府在四川的统治，特致函四川咨议局副议长罗纶，劝罗脱离清政府，早日筹谋四川独立，庆熙暗谋策动，自愿以武力相助。七月十五日（9.7）夜，赵尔丰逮捕蒲、罗等人的消息传到温江，群情激愤。县人曾学传、吴庆熙、吴直三、黄茂勋、何祖义、蒋希益等闻之，立即计议宣布起义。七月十六日（9.8），竖旗为“温江县保路同志军”，首举义旗，围攻成都。众推吴庆熙任统领，吴直三任分统，杨鹤琴为军师，郭煦、邓伟然分管钱粮及升降考核诸事。庆熙将吴直三从泸州带回的讨赵尔丰檄文张贴传播，号召各乡团勇响应起义。当日大雨滂沱，起义队伍连日夜行泥泞中向省城进发。七月十七日（9.9）温江各路同志军，抵省城南门外乐群

公园。七月十八日（9.10），附省十余州县同志军二十万众，四面进逼省城，温江李仙舟自和盛场（今柳江乡）率领和盛八保民军至省城与庆熙会合。温江起义的保路有同盟会员哥老首领李树勋、冯时雨，以及哥老首领罗守经、李仙舟、官文等，均陆续抵达省城。为了统一指挥，众推吴庆熙为“四川保路同志军统领”，旋改称“川西北同志军统领、人民复汉军总司令”。吴用上述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吴（吾）与诸同志袍泽约会于省门，故特先至……除去清法，官吏皆安如常，决不妄杀，待诸同志到，共举贤能，以定川中大计。”揭示了他保路、反清、爱国、爱民的初衷。各路同志军云集成都，反清力量使四川总督赵尔丰万分惊惶，在致电内阁请代奏的电文中说：“现有大股同志军最有势力者，惟温江、双流两处。……温江、崇庆同志军，占据要隘，四面设伏，现时成属各地，几乎无地不匪。”可见起义军声势之大。七月十九日（9.11）庆熙军声势之大。七月十九日（9.11）庆熙军与清军交战于草堂寺后，退屯文家场。庆熙深感人力不足，复出家财招集起义人民，后有寿安保黄星耀，兴利保简云龙及各地队伍来聚，队伍扩大到三万多人。七月二十四日（9.16）赵尔丰遣巡防军两路来攻同志军，在县属文家场（今成都市金牛区）辜家碾（乐平殿一带）两军展开激烈战斗，庆熙率部反复冲杀，毫无惧色，激战六小时，清军受挫，吴部暂撤至兴利场（今玉石乡）。此地距县城四十五里，与崇庆、灌县、郫县三县交界，能与灌县同志军张捷先、丁厚堂、郫县同志军张达三、崇庆同志军孙泽沛互为犄角，遏制清军。七月二十八日（9.20）赵尔丰派协统陈某率兵两营进驻温江县城，妄图镇慑。庆熙闻讯，